

当代浙江学术论坛 集萃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2007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LUNTAN
JICUI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7 当代浙江学术论坛集萃

(上 编)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全 文

伟大旗帜·正确道路·科学理论体系	雷 云(3)
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董建萍(10)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胡 坚(20)
地方行政行为中的潜规则:形态、风险及其整治	郭剑鸣(30)
土地股份合作制与农民权益保障	侯作前(42)
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的法律问题研究	吴光烈等(57)
农民工诉讼成本问题研究	鞠海亭(74)
试论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调处	
——以两个相隔近 50 年的群体性事件为例	金延锋(87)
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规制	韩灵丽等(100)
分野与兼容	
——公私法关系的现代抉择与物权法的属性	钟瑞友(109)
从元范畴和元命题看太极哲学与和谐哲学	杨成寅(123)
思想的历史创新与“中国哲学”问题	董 平(139)
儒学当代发展与创新的可能形态	
——民主仁学的再审视	吴 光(149)
陈傅良“民生”政治思想探析	方同义(154)
《周礼说》与“制度理想主义”陈傅良	王 宇(163)
孟子的修辞思想	池昌海等(178)
“X 是 X”和“X 归 X”格式的比较探析	周明强(190)
宁绍地区战国墓葬楚文化因素考略	陈元甫(201)
句章故城考	王结华(213)
玄学南渡与吴越自然主义的生成	姚 诚(221)

李白首次入越考辨	卢燕平(234)
试论浙南华侨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郭剑波(245)
东晋江南文学的发展与地域分布	
——以建康、会稽、寻阳为中心的文学考察	王德华(254)
明代江南地区六位女诗人的《悼亡》诗	
——兼论“悼亡”并非悼妻的专称	周明初(266)
论施彦端“进士”不是《水浒传》作者	马成生(276)
清末民初世界文学经典在浙江的翻译与传播	吴 笛(288)
消费时代的经典文化危机与审美范式转换	应小敏(296)
“逼近原作的形式”	
——再论译者的透明度	飞 白(304)
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英译	刘正兵(315)
合作原则与商务翻译的四条基本原则	徐锡华等(328)
欧美出版研究的发展路径与特色	吴 贇(335)
试论模糊性广告承诺	孙文清(344)
浙江省域社科文献信息资源的分布及特点	张耀东(352)
建设省域社科文献信息中心的意义和原则	徐璞英(363)
建立生态博物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保护	
——以江山三卿口制瓷作坊为例	於 超等(374)

论文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十大辩证要求	张国宏(383)
机遇、难题和挑战同在	
——十七大关于当前国际形势判断的几点解读	吕有志(391)
稳定工人群体的根本途径:劳动者集体权利	徐小洪(399)
浙江省、市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参政议政现状及思考	课题组(404)
论职务犯罪侦查管辖体系的重构	苟红兵(41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不起诉裁量权行使	
——兼论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修改完善	陈晓东(418)
我国完善侦查监督制度的理性选择	陈 然等(427)
来宋日僧南浦绍明在径山事迹考述	郭万平(433)
明嘉靖年间宁波地方接待设施小考	

——以日本来使策彦周良的入明记为史料	陈 越(439)
吴昌硕与白石六三郎	魏丽莎(445)
新发现的徐霞客与陈函辉交谊诗浅析	周 绮等(450)
话剧在天津及话剧“莎士比亚化”	洪忠煌(457)
被空置的欲望	
——从《夜宴》、《乱》中的女性形象建构谈起	王音洁(463)
现代汉语新语缀“霸”字析论	王明华(468)
要高度重视海洋文化的研究	刘 枫(471)
杭州社区文化建设居民参与度问题剖析	周 航(476)
论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原则	蔡 琴(481)
加强品牌建设与管理,提升开放教育竞争力	应 悦(486)
浙江茶产业发展需要科技支撑	江用文(491)
大众传播对青少年偶像崇拜的影响	
——浙江省中学生媒介影响实证研究	章 洁等(496)
论秘书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赵映诚(501)
创新秘书工作 服务科学民主决策	
——试谈新形势下秘书工作的角色定位与职责使命	薛 冰(506)
谈联合社科文献信息咨询服务问题	陈天伦(511)
信息精细化管理的探寻	金中仁等(517)
创新管理理念,实行科研档案的年度归档	汤镜秋(523)
论档案中介机构与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互动关系	郑金月(529)

论文提要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和探讨	陶岳潮(539)
科学发展观是真、善、美的统一	
——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哲学解读	王 康(539)
论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	
——从推动和推行、实行和实现“两创”战略的角度思考	黄建钢(540)
试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重点	
——党的十七大报告学习思考	任玉秋(540)
完善人大代表构成划分的若干思考	洪开开等(541)

浙江省女干部平等参政机制研究	课题组(541)
透视“草根民主”中的女性政治参与	周 健(542)
略论价值选择维度中的撤回公诉权	章晓民(542)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特殊诉讼程序研究	王祺国等(543)
政府信息公开与物权登记公示制度关系论纲	唐学兵(543)
构建和谐医院的几点思考	张金水(544)
1978 年至 1992 年浙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与影响	王祖强(544)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浙江的实践与发展 ——以“枫桥经验”为例	俞红霞(545)
回望历史 感情历史 ——马寅初《新人口论》遭受大批判的原由探微	徐忠良(546)
新时期浙江翻译文学探析	傅守祥(547)
浙商的文化自觉与农民工文化	王全吉(548)
媒介素养教育的认识误区与对策	张 芹(548)
用和谐理念指导秘书工作	方立明(549)
试论秘书的个人形象品牌塑造	张卫中等(550)
行政村和社区档案信息化建设解决方案的尝试	陈金冠(551)
创新档案管理体制 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赵林中等(551)

全 文

伟大旗帜·正确道路·科学理论体系

雷 云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集中表现在极其鲜明地宣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提出“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个重要科学概念和范畴,不仅在提法上是一个创新,而且对新时期新阶段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及其有机统一性的认识,内涵益见深化,脉络更为清晰,逻辑愈加严密。

“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个概念和范畴,是彼此贯通、密不可分甚至浑然一体的,但是它们的指向各有侧重,涵义也稍有不同。弄清楚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有助于深入学习和领会十七大精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侧重从党的政治纲领和方向目标的角度来讲的。

党的纲领是党奉行的主义,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政治主张的集中概括和反映。一个政党以什么为自己的纲领,决定了它的内在性质、历史使命和社会作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非常重视制定并实践正确的纲领,把它看作党的政治生命。恩格斯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列宁也指出,有一个能使大多数人民相信其正确的纲领,是“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1920年,毛泽东在给罗章龙的信中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

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也多次讲到过旗帜问题,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针对当时党面临的复杂形势,提出了“旗帜要鲜明”、“旗帜不倒”的问题。1997年,江泽民根据党在世纪之交面对的新问题新挑战,做出了“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的著名论断,并在十五大上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2002年他在十六大报告中宣布的这次大会的主题,开头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最后一句是“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2007年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则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为题。这些报告虽然在具体表述上不尽相同,但灵魂都是旗帜,主题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都是在我国改革和建设发展的关键阶段,鲜明地回答我们党举什么旗、朝什么方向走这一头等重大的问题。

旗帜代表纲领,纲领即是旗帜。我们党的纲领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部分。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党的最高纲领,在现阶段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是党的最低纲领,它的内容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要“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我们党的奋斗纲领正是这样的纲领,而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就将根据这个奋斗纲领来判断我们党的方向和形象。当然,实现最高纲领是将来的事情,实现这个奋斗纲领也是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十七大报告提出并反复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也就是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庄严宣告: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纲领决不会变;党的目标是明确的,方向是坚定的,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矢志不移、一往无前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不可动摇的。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实现最高纲领是实践最低纲领的远大目标和前进方向,实践最低纲领是实现最高纲领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但是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会到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设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条件,奠定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基础。我

们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坚定信念,又要脚踏实地地实践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纲领而不懈努力,把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正是十七大报告强调“全党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根据所在。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侧重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实践的角度来讲的。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时,毛泽东就以苏为鉴,总结经验,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制定“自己的建设路线”,以求“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迅速取得积极成效。只是不久因“左”的干扰,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正确的探索为违反科学、脱离实际的探索所取代,先后发生了“大跃进”的重大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严重错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而使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重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轨道。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是中国式道路新探索中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它为这一探索设立了核心和主题,指明了这一探索的总方向、总目标、总思路。

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中国式道路新探索中的又一个重要关节点。它为我国改革和建设设定了立足点和出发点,为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了最根本的现实依据。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就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正式确立的。因为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不发达首先和主要是生产力不发达,这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位任务。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需要有政治上的可靠保证,这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需要选择最有效的发展

途径,这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两者都围绕一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最后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这条基本路线充分反映了“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作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崭新论断,还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性质及其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同时对其性质、特点和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十五大以党的基本路线为依据并加以展开,提出初级阶段基本纲领,从基本政策和基本目标的层面系统阐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十六大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并首次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基本路线规定的总目标充实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一切也都是中国式道路新探索中的重要关节点,它们不断丰富、深化、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的发展前景。

这就是我们在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中开辟并不断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间已经取得的重大成绩和进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十七大报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一是社会主义,一是中国特色,必须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牌号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重复历史上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我们所讲的中国特色,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必然产生的特点,而不是什么随心所欲的标新立异。前述事实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但不是教条式地坚持,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坚持,是使之体现在中国特色中来坚持。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

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十七大报告作出结论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体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侧重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角度来讲的。

十七大报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些重大论断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一，这个理论体系的科学内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是它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构成这一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部分。

其二，这个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它不是离开老祖宗“另起炉灶”，而是在老祖宗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是在当代中国的新历史条件下说出了老祖宗未曾说过的新话，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东西。

其三，这个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它不是离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凭空而生的，而是与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在毛泽东倡导下就开始的、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长达半个世纪的不懈探索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炼、概括、升华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的认识而形成的。

其四，这个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即不仅肯定这个理论体系是对老祖宗学说的坚持和发展，指明了它与老祖宗的关系，从而确立了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整个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特定地位；并且肯定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指明了它与改革建设实践的关系，从而确立了它在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伟大事业中的指导地位。这是“历史地位”包含的两重涵义，把它们综合、统一起来看，这个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就十分清楚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前后相继、相互联

系、相辅相成因而不可分割的。其所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为主线，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并使之贯穿于始终的，由三个主要部分有机构成的完整统一体。它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是新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唯其如此，这个理论体系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因此十七大报告作出结论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命题，同时指出这个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贡献。这一命题有两大创新意义和特点优点：一是把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理论探索和研究的重重大成果予以整合、集中、提炼，作出简洁、鲜明、确切的高度概括，指明了在新时期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途径，规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表述方式；二是坚持了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延续性、连贯性和开放性，不仅可以包容毛泽东作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正确理论观点，还可以囊括今后党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而充分体现“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质和重要特性，并且显示了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定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向前推进的客观趋势。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关系，可作这样的理解：

“道路”是在基本路线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实践和主要内容，“理论体系”是这条道路的理论总结和逻辑概括。“道路”是“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检验标准，“理论体系”是“道路”的思想指导和行动指南。“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化，“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际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归根结底，两者的核心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相统一。

“旗帜”是在“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概括，它包含着“道路”和“理论体系”，它的实际内容就是“道路”和“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真正高举这面伟大旗帜。我们要以坚持这条道

路和这个理论体系的实际行动,来高举这面伟大旗帜;要在这面伟大旗帜的引领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广,使这个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开放。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 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推荐)

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 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董建萍

新时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许多研究注意到了其间两个最明显的波峰：一个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高峰；一个是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逐渐上扬的曲线。今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发展的渐进性已被广为认同，发展的内涵和需求不断地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和规律性。

一、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致阶段如下：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

这一阶段也可划分为起始、急进、回落调整三个小阶段。

1. 起始。政治体制改革破题。标志是 1980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目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8.18”重要讲话。讲话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下发全党。这是当时中央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晶，也是邓小平最初考虑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集中体现。当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最主要的思考和目的是如何从制度上防止类似“文革”的事件再次发生。因而当时对体制弊端的最大批判点集中于“领导者个人过分集权”。认为尤其是在全社会存在严重的个人崇拜情况下，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力实际上失去了制约，因此当时最迫切的改革要求是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恢复和发扬民主，尤其是党内民主，以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不被个人的错误拖入深渊。1982 年召开十二大，

尽管对政治体制改革着墨不多,但是明确发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呼声。不仅强调民主,而且要求“高度”民主,反映了“文革”结束后党内外迫切的民主呼声。

2. 急进。推出第一个总体设想。80年代中期,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推动下,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点发展到面,领域不断拓展,改革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与原有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日益显现。1986年6月,邓小平听取了有关的经济改革情况汇报后,强烈意识到政治体制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鉴于现实发展,党政分开成为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诉求,要求理顺党政职能,简政放权,党委不应过多地干预经济问题。在邓小平的主导下,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拿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这一设想经中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最后成为十三大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十三大最大的贡献实际上是两个,一是第一次系统论述初级阶段理论,一是首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十三大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3. 回落调整。众所周知,1989年—1991年,国际国内大气候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风险猝不及防地展现在我们面前。1989年后的国内政治气候一度明显表现为谨慎、反思甚至某种倒退。现在看来,当时有两大因素决定了中国改革的继续推进:一是邓小平的坚持,他说了“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最后在视察广东深圳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带时发表了“南方讲话”,给徘徊中的中国改革事业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二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市场化趋势已难以扭转,人民群众普遍拥护改革开放的路线,体察老百姓呼声的许多地方政府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重要支柱。例如当时在全国讨论以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时,浙江大多数学者和地方官员几乎同声驳斥对“温州模式”的某些指责,坚持“我们没有搞资本主义”。广东、上海、福建等改革开放前沿的地方政府,都旗帜鲜明地要求坚持改革。

1992年以后,改革的大方向坚持下来了,但改革的格局有变化,即经济体制改革加速,政治体制改革放慢脚步,转变策略,先做相对容易的局部的事(正向调整)。由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与之前也有了明显区别,党政分开、高度集权、社会对话等问题在宣传舆论的层面上明显淡化,主要任务表述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制度。有些专家事后评论,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征,是从改革总病根的“攻坚战”转移到清除总病根外围的“外围战”。舆论上的主要批判点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